

第一章 体制转型和价值观的震荡

我国正处在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时代。这种转变是自觉的。中国共产党人历经 10 年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和 10 年内乱的挫折，自己对历史经验教训作了深刻的反思，主动打开了改革开放的大门，逐步形成了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并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

但是，也要看到，伴随着社会经济体制的转型，思想观念上的冲突、转变和更新都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是十分痛苦的。因为经济体制的转型不是一般地选择发展经济的手段和方法，它涉及对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的重要变更，涉及对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的重新认识，它极为深刻地牵动着我们原来的价值观，并提出了一系列需要我们回答的问题：如我们选择社会主义是不是选择错了？在我们人生观、价值观领域，是否也应当通行市场经济等价交换的法则？在今天不断涌动的市场经济大潮下，是不是要抛弃那些信仰和理想，重新确定自己人生的价值目标？在金钱、物欲充斥社会各个角落的情况下，我们该不该改一下“迂腐”的人生哲学，转换一下社会角色，变动一下衡量是非曲直的标尺？……这些价值观上的困惑、振荡和抉择，对社会进一步的变化发展又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关系着我国应建设什么样的市场经济，培养什么样的主体人格，树立什么样的奋斗目标，创造怎样一个世界等一系列带有根本性的问题，需要我们认真进行研究，并给予正确的回答。

第一节 发展市场经济的难点

价值观和市场经济有着直接的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关系。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改革的目标模式本身就是我们新的价值选择，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则带来了人们价值观上的震荡，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为突出的困难，就是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培养和树立起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价值观。

通向市场经济之路在我们国家是坎坷而又曲折的。这与过去我们在价值观上存在的偏差直接相联。解放初，我国基本上按苏联的经验建立了计划经济的体制。对毫无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中国领导人来说这是无可厚非的。当时只有苏联才是中国的朋友，只有苏联才是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榜样。况且，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央根据自己的实际曾采纳了陈云同志的意见，把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作为计划生产的补充。在这点上也比当时的苏联做得更好一些。但后来我们在价值取向上脱离了实际，不顾中国生产力十分落后的状况，片面追求纯而又纯的所谓社会主义，把中国的社会主义禁锢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内，致使这种作为辅助地位的市场三起三落（1957年、1959年和1962年便是起落的转折点），甚至被作为“资本主义尾巴”要彻底铲除，从而使中国经济陷入了僵化和发展迟缓的困难局面。

十一届三中全会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邓小平同志1979年11月26日在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兼副总裁吉布尼等人时首先明确提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①后来，他又陆续十多次讲到类似

^① 《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论述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95页。

的观点 但直至 1992 年春天南方讲话之后，他的观点才被全党重视 并在 10 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被接受 其间经历了 14 个年头。而从实际情况看，这一目标模式的真正被认同决非易事，它的建成则更需要相当的时日。正像江泽民同志指出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怎么实行市场经济，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两种不同的经济体制如何有效地衔接和更替，其间有许多复杂的情况需要研究，有许多突出的矛盾需要解决。”^①“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②

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困难来自许多方面，观念上的排斥是一个重要原因，可以说，阻力既来自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也来自传统的资本主义观念和传统的封建主义观念。这些观念除了认识的原因之外，说到底也都有个价值观的根源。

搞市场经济离不开商，更离不开对商的重要地位的认识。然而，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长期处于以农为本的自给自足自然经济中。自汉以来 在封建权贵和礼教的重压下 商人地位低贱 口碑不佳，重农抑商成为一项长期的国策。旧时对民的划分叫做“士、农、工、商” 商被放在最末一位。与士的清高儒雅相反 商人成了奸诈油滑的典型。无商不奸 士人不入商业流 商人成了官府、士人、地主、土匪都可以压迫、盘剥、欺侮、抢劫、耻笑的对象。《汉书》记载，当时明文规定商人不准衣锦、骑马、操兵器。而西晋王朝则要求商贾都得带上标有自己姓名和所经营商品名称的头巾，脚下则必须穿一白一黑的阴阳鞋，以示与其他人的区别。晋末的前秦，工商皂

江泽民：《抓紧普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知识》，《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发展出版社 1993 年版 序 第 3 页。

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隶不准穿金银锦绣，违者甚至要砍头。在大一统封建专制下的中国，商业虽然也曾相当繁荣，但商人从来都只是官僚、地主的附庸，不能也没有得到独立的发展。

从传统文化角度来看，中国社会不仅商业地位低下，而且存在着对商业（市场）意识的排斥。孔子曾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①已经蕴含着对利的贬斥。汉朝董仲舒进而提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②将义和利完全对立起来。这句名言，对后世影响极大。至宋明理学时更是将这一思想发挥到了极端。朱熹所谓“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③“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始是学”，^④完全摆出了一副道学先生的面孔。只讲义不讲利、耻言金钱、贬斥经商的说教被抬成千年来的正统思想，而且常常变成一种很虚伪的东西，与权贵们对百姓的巧取豪夺、穷奢极欲的生活相映衬，组成了一道奇特的风景线。这些封建观念，至今为止，仍沉积在一些人的思想深处。十年内乱时期，在铲除封、资、修的“革命”旗号下出现的禁欲主义和无视一切个人利益的现象中，我们还时时可以看到这种观念沉渣的泛起。即使今天，透过权钱交易、强行摊派、划地为牢、占山为王等前资本主义手段，也还可以看到这种观念的影响。它们的存在对市场经济的正常发育起着抵制和破坏的作用。

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则是我们迟迟迈不开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步伐的主要原因。这种观念认为社会主义不仅要搞公有制、按劳分配，而且应该搞计划经济。有些同志至今对搞市场经济仍然想不通。他们认为搞市场经济就是鼓励人们自私自利，就会搞成两极分化，就会破坏社会主义原则。在他们看来，现在搞市场经济，有的人

① 《论语·里仁》。

② 《汉书·董仲舒传》。

③④ 朱熹：《语类》卷十二、卷十三。

发了财 甚至成了百万、千万、亿万富翁 私营企业、外资企业大发展，他们雇佣打工仔、打工妹的数量早已超过过去的一些资本家。而国有企业的比重下降，并且面临着重重困难。社会上有些人富得冒油，可还有许多人生活在贫困线下，不少工人下岗失业，生活艰难。社会道德水准也下降，风气变坏，治安状况也不佳，贩毒吸毒、卖淫嫖娼、拐卖妇女儿童，金屋藏娇甚至公开纳妾养小老婆等丑恶现象也死灰复燃……这样搞下去，势必从根本上瓦解生产资料公有制 败坏整个社会风气 背离社会主义。因此 这些同志往往认为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上是挂社会主义招牌，搞资本主义，是违背马克思主义，也违背社会主义宗旨的。

反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观念还来自传统的资本主义立场。他们认为中国搞社会主义已经被历史证明行不通了，只有回过头来搞资本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市场经济是私有制的产物，与私有制密不可分。只有在私有制的条件下，资本所有者追逐资本收益最大化，才能使市场经济在竞争中实现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既然发展经济要搞市场经济体制，就必定要搞私有化，因此就不要管什么社会主义了。这种观念公开发表的不多，私下议论的却不少，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表现更是相当普遍。大家只管自己挣钱、发财，谁有本事 谁多挣钱。商场如战场 成者为王败者寇。不管使什么手段 只要能赚钱 又不被抓到把柄 你就是竞争中的胜利者。于是 财富成了能力和价值的尺度。有了钱便有了一切，又成了一些人的信条。想尽一切办法，牟取私利成了市场经济口号掩盖下迅速膨胀起来的一种价值观。

上述观念对我们干部队伍有很大的腐蚀作用，也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育发展带来了许多障碍和混乱。譬如，有权的就会信奉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于是利用已有的权力大搞权钱交易，贪污受贿，腐化堕落，为着自己一点点蝇头小利不惜给国家或集体造成巨额损失。这种权钱结合也使行政权力和经济的分离变得十分困难，

市场经济出现极不正常的情况；该下放给企业的权力被中途截留，各种部门利用职权乱收费多收费，或者大搞管、卡、压。如果不进贡，不使某些干部和管理人员私人得利，他就用权力进行刁难，合法的也可以变为非法的，阻碍正当的市场行为，而只要金钱铺路各方面摆平了，非法的也可以成为合法的，从而为不正当竞争大开后门。没有权的也各显其能，利用亲戚、朋友、老同事、老同学等等各种关系，通过请客送礼等各种方法，打通关节，以便在市场中捞取更多的好处。而还有些生产经营者则依靠假冒伪劣、坑蒙拐骗等欺诈行为进行不正当竞争来谋取自己非法的利润。特别是还有不少人拼命利用当前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完善和国有资产管理上的漏洞，化公为私、化国有为集体，捞取自己一个部门、一个单位、一小部分人的私利，造成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这种情况如果任其泛滥，中国的市场经济就会引向邪路，不仅不能建设起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而且会重蹈一些国家的覆辙，搞成一个畸型的腐败的为权贵所垄断了的市场，使中国现代化的前景又成泡影。而且当前出现的这些现象如果不能正确对待和引导，也将为反对市场经济的观点提供了口实。

除了以上几种错误观念和行为直接关系着我们要不要搞市场经济、搞什么样的市场经济之外，干部群众中还有其他许多妨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观念，其中大也都涉及人的价值取向问题。从过去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需要各个企业从原来政府的附属物变成独立的经营者。旧体制下的厂长基本上是生产厂长，还不是经营厂长。那时，厂长有困难就向行政隶属的领导部门反映，请求帮助解决。市场经济体制下，厂长作为独立的经营者就和过去的厂长不同，他应当在广阔的社会市场中去寻找解决困难发展自己的条件和契机。但是，在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我们不少厂长思想上一下子转不过来，往往习惯于原来那套计划指令的安排方法，习惯于等、靠、要，而不适应新的形势的条

件。结果出现了没有婆婆也要找个婆婆的怪现象，非得有个部门管着他，他才踏实、舒坦。内心里有着对市场的恐惧，也有着对市长（上级有关部门）的依赖，成为一个长不大的孩子。

不仅企业干部有这种倾向，就是广大群众中也有类似的倾向。几十年大锅饭吃下来了，生、老、病、死连住房等等都是国家包下来了，不用担心，不用费大力气，虽然吃不好，但也饿不死。只要不犯大错误，大家干好干坏差不多，都可以躺在国家身上。现在要打破这种“大锅饭”，形成人才交流、人才竞争的激励机制，也会碰到极大的思想观念上的障碍。待业的、下岗的有牢骚、不满情绪是很自然的，处理不好还会影响安定团结，影响整个改革开放的大局，甚至成为制约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关隘。群众实际生活困难问题，要通过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保障制度来解决，但是还有大量的观念转变的工作要靠我们去做。只有观念上有所转变，提高了对市场经济的承受力，才能化消极为积极，在市场中去寻找、去开拓、去创造自己的新生活、新发展。

市场经济不仅需要培养具有独立意识的企业和个人，而且需要培养具有法制意识的法人和个人。但是，传统文化和旧的体制，特别是十年内乱对法制的破坏，造成了人们对法的轻视。权大于法，以一时一地的政策代替法规，这仿佛是很正常的现象。在干部群众中法制观念淡薄，无法可依、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情况比比皆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纠正了工作中的错误，大大加强了法制建设。但法制意识的形成是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尤其在新旧体制转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整套法律法规尚未建立健全和完善起来的时候，法制意识上的问题更为突出。一些胆大妄为者钻国家法规尚不严密、执法尚不严格的空子，自以为法不罚众，自以为聪明机智有路子犯点法无所谓，自以为手法隐蔽人家不知道，他们越来越肆无忌惮。长此以往，其结果将会使市场经济赖以运行的法规失去应有的权威性。有的生产经营者无法无天各显神通，巧取

豪夺无所不为，得不到法律的制裁；合法的正当的生产经营者，却得不到法律的有效保护；被侵犯利益的法人和个人又缺乏用法律手段保护自己正当权益的意识和能力。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使市场中的不正当行为得不到抑制，而且使市场网络本身相互制约的作用也受到很大损害。

搞市场经济还有一个对市场经济原则运用范围的评估取舍问题。尽管中国古人讲了许多“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①等辩证法，当代中国学过马克思的辩证法的也不在少数，但是，许多人做起事来往往大呼隆、一阵风，形而上学得很。说搞市场经济，那就什么都要进市场，大家都下海经商，什么都变成了商品。于是乎，在个人或小集团的眼前经济利益的推动下，下海狂潮，一阵又一阵，仿佛要吞没一切似的。但党的十四大报告对市场经济的定位则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②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当然涉及着我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外交等方方面面的变革，但市场经济等价交换原则决不是所有这些领域都要通行的。相反，唯有某些领域中不通行等价交换原则，才能保证在经济领域的资源配置上市场经济的正常运作。倘若我们的行政、执法机关也都完全搞有偿服务等价交换，那么国家社会的公理、正义和尊严将何在，又如何能保障企业的独立自主和市场中的公平竞争，如何能保障形成良好的市场环境。只有保证党政机关和行政、执法部门的高效、清正、廉洁，杜绝腐朽庸俗的唯利是图观念的侵害和腐蚀，我国才能更好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① 《老子》。

② 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 1992 年 10 月版，第 23 页。

即使在经济领域中，是不是搞市场经济就等于唯利是图，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只管赚钱，不问社会影响、社会效益呢？实际上也不那么简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生产经营者，其生产经营目的已与以往资本家单纯为了获取最大利润有所不同。共产党的领导、劳动人民在国家中的主人地位以及公有制经济的主导地位使得我们社会生产目的变成以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为中介，并自觉地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为最终目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虽然承认一般劳动等价物——货币的地位，并积极发挥它在市场中的作用，但是这个一般等价物已经放在其应有的位置上，不再是支配人而应当为人所支配。何况，就是在资本主义国家里，一些有头脑的经营者（资本家）也从生产的本来意义上思考了这个问题。日本著名企业家松下电器的创始人松下幸之助通过思索后提出：“所谓实业人的使命，就是要克服贫穷，使社会全体脱离贫困，达到富有。买卖或生产的目的，并不在于使商店或制作者繁荣；借着工作和活动使社会富足，这才是真正的目的。”^①他以这一目的的树立日——1932年5月5日，作为松下电器第一届创业纪念日，并以此作为松下电器的真正使命不断激励企业员工。松下幸之助尚且能这样做，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中国企业就更应该认识到生产的真正目的，并自觉地实现这一目的了。只有对市场经济、市场法则有一个准确的定位，把它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作为发展生产力以满足人民需要的手段，方能建设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诸如此类，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我们遇到的亟待解决观念上的问题还有很多。这些观念都是受一定的价值观支配的。可以说，在经济体制大转型过程中，我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面临着如何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如何正确看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在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当树立什么样的价值

观等问题。而我们的价值观及其统率下的观念体系转变如何，又支配和影响着我们的行为，关系着这场体制转型的方向和成败。

第二节 精神文明建设的困惑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除了搞好物质文明的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没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也就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则是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建设。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一段时间里出现了“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精神文明建设虽然也在抓，但总不理想，令人困惑。其根源也在于建设市场经济中价值观上产生的震荡。

应当承认，我们党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抓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同时，是十分强调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邓小平同志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就旗帜鲜明地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长篇报告，就搞好党风、社会风气提出了要求。1979年9月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在讨论叶剑英同志“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稿时，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要求，并将它列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必要条件。10月，邓小平在第四届文代会的祝辞中进一步提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①1980年12月25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又再次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性，指出：“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②之后，他多次反复强调伴随我们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①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208、367页。

进程有四项工作：“第一，体制改革；第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第三，打击经济犯罪活动；第四，整顿党的作风和党的组织”^③，并称这四项工作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四项必要保证。为了抓好精神文明建设，在十二届六中全会上中央专门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的高度阐述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形成了我党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基本理论体系。与此同时，中央和地方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次次掀起了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热潮。

但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实际状况却始终不尽人意。1983年底开始至1987年春结束的新时期整党工作虽然使党风和干部作风有一定的转变，但整党工作发展不平衡，成果极不巩固，不少地方还走了过场，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其间，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央书记处都曾花气力解决群众意见较大的党风不正问题。邓小平同志甚至强调抓党风要从具体事件抓起，像“三反”“五反”时那样。“1952年杀了两个人，一个刘青山，一个张子善起了很大作用，现在只杀两个起不了那么大的作用了，要多杀几个，这才能真正表现我们的决心。”^④陈云同志也说：杀一儆百。杀一些可以挽救一大批干部。中央的这些决心和措施也确使党员和广大群众精神为之一振，种种不正之风有所收敛，但党风社会风气仍不能从根本上好转，甚至出现了一些更为严重的以权谋私和官僚主义的事件。

与此同时，社会上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针对1986年12月中下旬发生的学潮，邓小平发表了《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讲话，加上各级党组织的疏导，使学潮很快平息。但是，时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403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53页。

隔不久又出现了 1989 年的政治风波。造成这场动乱“其中一个原因，是由于腐败现象的滋生，使一部分群众对党和政府丧失了信心。”^①而无论从党内腐败现象还是社会上自由化思潮来看，教育都是十分重要的。因而小平同志回顾总结十年的发展得出结论：“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教育发展不够”^②，并对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③。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吸取了“一手硬、一手软”的历史教训，十分强调精神文明的建设。不仅在清理清查和干部考察工作基础上对全党进行了一次做合格共产党员的教育，在部分单位进行了党员重新登记，而且加强了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加强了党风和廉政建设。1989 年政治风波刚平息，党中央、国务院就作出了《关于近期做几件群众关心的事的决定》，着重抓了七件事，即：进一步清理整顿公司；坚决制止高干子女经商；取消对领导人员少数食品的“特供”；严格按照规定配车，严格禁止进口小轿车，严格禁止请客送礼；严格控制领导干部出国；严肃认真地查处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犯罪案件，特别要抓紧查处大案要案。1990 年 3 月十三届六中全会又通过了《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同年 11 月，党中央批转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提出的《关于加强党风和廉政建设的意见》。党中央不仅针对实际存在的党风党纪和社会风气问题不断作出许多具体规定，而且从领导干部自查自纠、查处大案要案、纠正行业不正之风三管齐下抓党风和廉政工作，并强调必须从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抓起，必须贯彻“一要坚决、二要持久”的方针。此外，党和政府加强了对各类犯罪活动的打击力度，认真进行“扫黄”斗争，也加强了思想政治工作，恢复和改进以往长时期有效但一度被弃置的思想教育工作制度和办法，通

①②③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300、290、314 页。

过大力表彰先进模范人物，开展学雷锋学英雄人物等一系列活动，发扬社会主义正气、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十四大更是提出了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的重大战略任务。1994年1月党中央又召开了建国以来第二次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全面提出“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强调要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指导下，贯彻党的十四大和十四届三中全会精神，按照“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研究和部署在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宣传思想工作。1994年9月，十四届四中全会还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1996年10月，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专门讨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问题，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通过这许多工作，精神文明建设这一手确实也硬了起来。

但是，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应注意到至今为止党风和社会风气仍未根本好转，有的问题甚至还在发展，精神文明状态仍然离人们的期望相距甚远，精神文明建设的任务十分繁重。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一方面我们加强了打击经济犯罪的力度，狠抓大案要案取得了明显的成果，但另一方面经济犯罪案件的数量却不断在增加，案值明显增大，所涉及的干部人数和级别也在上升，而且有许多是顶风作案和群体作案（群蛀）；一方面我们在“扫黄”和打击社会丑恶现象上采取了很多重大措施，也确实对社会有着震撼作用，但另一方面社会丑恶现象不仅屡禁不绝，而且还有继续蔓延的趋势。其中最典型的事例就是震惊中外的陈希同、王宝森的案件。此案的揭露充分表明中央惩治腐败的决心，但也说明党内腐败现象的严重程度。

为什么在新的历史时期会出现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为什么我们在精神文明建设上下了大气力但效果却不理想？为什么今天

的精神文明建设抓起来这么难？其深刻的原因在于体制转型带来的人们价值观念上的变化和混乱。这不是个别人的观念的变化和混乱，而是相当多人思想观念的变化和混乱，它不仅是个别观点的变化而牵涉着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上的变化，从而影响着人们对一系列问题判断的变化。这种变化交织着合理和不合理、前进和倒退、积极和消极、新的因素的成长和旧的渣滓的泛起，使原来判断是非的准则受到了冲击，因而使人们面对新的形势、新的问题，感到费解迷惑，无所适从，一些人甚至随波逐流。

过去，人们比较信奉“越穷越革命，越穷越光荣”，有钱要藏起来，富也富在肚子里，生怕与剥削挂上钩，与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挂上钩。现在，钱是成功的象征，“大款”们神气活现成为人们羡慕的对象。炒股票发大财的人不仅公开他玩股发财的经验和收入，而且应邀举办各种讲座传授生财之道。东北一位农民企业家，因其经营上的成功，成了亿万富翁后，更带来了政治上的荣誉，获得了政协委员的头衔。高消费、大把大把地花钱过去被看作是挥霍浪费，现在成了潇洒。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为国家创造财富的劳动模范好像也失去了昔日的光辉，被有些人称为“憨大”、“傻瓜”。像“抓斗大王”包起帆那样把自己创造发明得到的奖金分给了为创造发明做过后勤工作的同志，则被有的人认为是新的“大锅饭”。“炒买炒卖”、“买空卖空”、“皮包公司”曾被冠上“投机倒把”的恶名。现在一些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则认为它们是商品经济高级发展阶段的一个标志。请客送礼、拿回扣，乃至行贿受贿，也被不少企业作为必不可少的促销手段和一些人眼中的正当收入。干部辞官经商早已屡见不鲜。有些人对过去被看作是崇高的职业不屑一顾，过去被看作是神圣的字眼，现在也被一些人讥为讲大话、放空炮……

观念上的变化和混乱包括价值观上的振荡是建设市场经济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它并不是坏事。相反只有观念的变化（当然，变化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带来混乱），才进一步推动着整个社会体制的

变革。但是这种观念上的变化和混乱除了有积极的更新的作用以外，也给精神文明建设带来了许多新问题和困难。如果像杭州北高峰顶端筑起的财神庙一样，钱被安置在人们追求价值的顶峰，它便对过去几十年社会主义所培养形成的价值体系带来巨大的冲击，会使人们观念发生着极大的紊乱。这样对社会所具有的破坏性影响亦是不可低估的。

那么，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我们要不要、能不能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精神文明？怎样去建设精神文明？这些都是人们关心的，也是颇感困惑的问题。而所有这些都通向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人们应具有什么样的价值观。

第三节 具有时代意义的课题

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我们应该树立什么样的价值观，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实践提出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关系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历史命运的重大课题。

众所周知，社会主义曾在全世界取得过辉煌的胜利。社会主义好，不仅是中国人民的赞歌，而且曾是飞扬于全世界亿万人民心中的呼声。连一些社会主义的敌人，也曾举起过这面时髦的旗帜。但曾几何时，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又转向了它的低谷。先是执政的共产党内部思想僵化和教条主义带来了政治、经济等发展中诸多矛盾的堆积和激化，继而是自由化思潮的泛起甚至侵蚀到共产党内部领导的核心，直至后来苏东剧变、社会主义阵营解体。值得注意和庆幸的是，中国的社会主义虽也几经曲折一度走到经济崩溃的边缘，可是中国共产党人在粉碎“四人帮”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基础上，痛定思痛，从“左”的思潮束缚下比较彻底地走了出来。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另辟蹊径，逐步形成了一条新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 80 年代世界性的社会主义经济萧条、滞胀的

形势下，中国却是风景这边独好，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关键时刻顶住了当今世界来势凶猛的反社会主义潮流。

中国现象很值得我们思考：1. 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社会主义运动会发生如此巨大的转折？2. 为什么中国的社会主义能够顶住这股反社会主义的潮流？她靠什么？3. 中国将来发展趋势怎样，是否真的能够坚持住社会主义方向，再造社会主义辉煌？

这些问题都是当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需要深入研究，作出科学回答。但历史的事实至少说明了以下二点：

第一，我们的时代已经并正在进一步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不能适应当今时代的要求了。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在今天历史条件下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必须进行再认识。

邓小平同志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正反经验，特别是十年建设十年动乱的错误和教训中及早地看到了这个问题。他在 1980 年 4 月 12 日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的谈话中就敏锐地提出：“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①同年 5 月会见几内亚总统杜尔时，他又强调：“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②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党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实际上就是对社会主义的再探索、再认识。由于有了过去几十年的经验教训，由于我们善于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纠正错误，我们的探索是成功的，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大大深化了。其显著的标志是邓小平同志 1992 年春天的南方谈话。在这篇著名的谈话中，他

^②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312、313 页。

深刻地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①十多年来我们国家之所以会有如此巨大的变化，令世界刮目相看，在 1989 年政治风波和接踵而来的苏东剧变的世界性潮流中，中国党、中国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巍然屹立，而且变得愈来愈坚强，就是因为我们在什么叫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及时地解放了思想，抛弃了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同时，实行了开放政策和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并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改革的目标模式。事实证明，我们的改革开放政策是适应当今时代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的，是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强国之路，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兴旺发达的必由之路。

第二，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建立和发展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伟大创举。不仅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从来没有说过，而且整个市场经济发生发展的历史上也未曾有过。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体制能不能相容？什么样的条件下它们才能相容，才能既使经济充满活力高速高效地增长，又坚持并发展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逐步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都要在进一步的实践中去探索 and 解决。正确解决这一问题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在中国乃至在世界上能不能站住脚，能不能重振雄风再造辉煌，直接关系到中国的命运、社会主义的命运乃至世界的前途。在这重大的转折关头，要能把握住正确的方向，关键是处理好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和市场经济这一手段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在经济体制转型，人们思想观念随之发生着深刻的变

^①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373 页。